

性別與階級的交織：臺灣越南新二代文化認同探究

阮國煌輝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

梁瀨文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育學院博士候選人

李淑菁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一、前言

本文作者之一 2014 年自越南赴臺求學，在臺留學期間結識許多同樣來自越南的同鄉，眾人來臺的原因多樣，包括結婚、工作和留學，並經常透過宗教與相關文化活動組織聚會，提供彼此在異國他鄉互相支持的資源和能量。其中，經常有越南籍母親帶著子女參加活動，然而新二代子女卻展現出不同的語言程度—有的孩子對答如流、有的孩子卻完全聽不懂越南語。

語言在文化傳承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而新住民子女對於父母原生國家的文化認同往往反映出不同新住民家庭的教養環境差異。儘管現有研究指出個體的文化認同程度越高，其文化適應能力也會越好（張文馨，2016），但卻較少討論新住民家庭環境，以及家庭中的權力結構，對於子女文化認同之影響。本文作者在 2022 年 11 月間訪談三個新住民家庭以及一位越南籍資深國小教師，根據訪談資料從文化再製（cultural reproduction）觀點剖析新住民家庭權力結構中的性別以及階級對於新二代文化認同之影響，並提出相關建議。

二、社會經濟地位對家庭教養觀念的影響

法國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所提出的「文化再製」概念描述文化如何透過家庭、學校及社會制度在不同世代之間延續或者複製（1990）。文化再製觀點指出主流或者優勢階級的文化，包括價值觀、行為模式以及語言，會透過家庭資源及學校教育獲得強化，進而鞏固現有社會不平等的結構。然而文化再製的過程需要基於個體對特定文化的認同，並透過教育及規訓來強化該文化的傳承。鄭曉雲（1992）認為「文化認同」是指個人對特定族群文化的態度與行為，並將該文化的價值體系內化成一種習性（habitus）。文化認同除了奠定族群的價值取向，同時有助於發展族群文化的認同感與凝聚力。

新住民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social-economic status）對於子女的教養觀念有深刻的影響力，進而影響家庭中的文化再製與認同。社經地位較高的新住民家庭，父母對於孩子的教育資源投入程度較高，且較有時間陪伴孩子成長。大學剛畢業的新二代小婷，小學三年級以前都在越南與外婆生活。小婷最初一句華語都不會，但因為父母在臺經營越南餐廳，有較好的經濟能力，也相對重視女兒的教育，因此在父母的鼓勵，以及教育資源的支持下，小婷在小學六年級時便能適應在臺生活，並且對於自己身為越南新住民二代的身分有高度認同：

「我是喜歡當臺灣人，但是我不能忘記我的根，因為我其實也是有某一部分的越南人。我不能忘記這個文化，忘記那個國家、忘記我的家鄉，我覺得這是一定要有。」（小婷：8）

小婷的母親玉蘭來自越南，憑藉著一手好廚藝與臺灣丈夫阿雄一起經營越南餐廳，也讓她的母國文化在夫家受到肯定。阿雄在訪談中也對妻子的能力與越南文化表示認同：

「這個家庭環境還不錯，相比其他人，媽媽也算是很成功。其他人可能是在工廠上班，不要說是越南人了，我們臺灣人在工廠上班也會有自卑感。」（阿雄：15）

玉蘭的能力為夫家帶來較好的收入，也讓她的母國文化在臺灣的家庭中獲得肯定，進而影響子女對越南文化及二代身分的認同感。然而另外兩個新住民家庭社經地位相對較低，父母需投入更多工作時間維持家庭生計，因而較難有機會教導子女越南語及文化薰陶，使得孩子無法接觸越南文化，進而降低對越南文化的認同。

此外，新住民子女在學校中常有遭受歧視或者言語侮辱的經歷，若家長未能及時提供輔導與支持，孩子會因外界的有色眼光與汙名標籤而逐漸對越南文化喪失認同感。教師玉梅在 1975 年西貢淪陷後輾轉逃離自臺灣，透過自學與旁聽大學課程，成為國小越南語教師。玉梅輔導過許多新二代學生及家長，觀察到一些越南籍母親因自身教育地位不高，與臺灣人結婚之後受到夫家的影響而認為孩子應該融入臺灣社會：

「很多嫁來都是因為原本環境不好，她們沒讀過書就嫁來臺灣，甚至有的不會讀越南文的，這樣她的觀念就會非常保守。她就會要求孩子不要學越南文。」（玉梅：11）

母親在亞洲社會傳統家庭結構中經常扮演子女主要照顧者的角色，因此母親的教養觀念對子女的文化認同有直接影響。然而訪談發現家庭的社經地位會影響母親對子女的教養能力與觀念。玉蘭的好廚藝為夫家帶來較好的收入，因此玉蘭的母國文化受到丈夫的肯定，也讓女兒小婷對母親的文化及自己的新二代身分高度認同。然而對於更多來自社經地位相對弱勢的新住民家庭而言，母親大多從事藍領勞務，也需要投入較多的工作時間而難以教養子女。

三、性別與階級的交織：家庭權力結構中的新住民母親

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涉及家庭、學校、經濟與權力關係（林坤泰，2014）。除了家庭社經地位對於新住民家庭中文化再製與認同的影響力之外，家庭內部權力結構的影響也不容忽視。新住民母親經常扮演家庭中的主要照顧

者，但卻也同時處於亞洲父權社會家庭結構中的弱勢地位。在崇尚「以夫為綱」及「孝道」（Filial piety）觀念的傳統華人家庭當中，丈夫與公婆的觀念經常影響母親在家庭中所擁有的教養權力。

蘭芳與紅英為社經地位較低的越南籍母親。儘管在臺生活多年，兩人在家庭中展示越南文化給子女的機會相當受限，也導致子女長大後對於越南文化缺乏認同感。蘭芳的丈夫對於妻子使用自己聽不懂的語言表現出排斥與不滿，也不允許妻子教孩子越語：

「生活中媽媽（自己）要打電話回家鄉，講母語，爸爸（丈夫）聽不懂，懷疑不知道她講什麼。所以即使想要教小孩越南話也教不了，因為爸爸不給教。」（蘭芳：1）

另一方面，臺灣公婆對於兒媳的管束與規訓也讓新住民母親難以在家庭中展示與傳承母國文化。紅英的公婆認為媳婦嫁過來就是要學習臺灣家庭的文化。紅英不但被禁止在家中講母語，更被公婆要求學習閩南語：

「如果在都市裡結婚，公婆跟老公的思想比較會有平等。但如果是在鄉村或小島裡，公婆的觀念就會很保守，例如他講閩南話，和媽媽（兒媳）溝通會困難，公婆會要求母親和小孩都要學閩南話。」（紅英：2）

然而，同樣作為新住民媳婦及母親，玉梅因長年在國小擔任教師，除了擁有較好的經濟能力之外，在家庭中對於子女的教養及文化傳承也有更高的話語權：

「我的孩子並沒有排斥學越南語的情況，我教他們基本的語言以後，他們大學時就自己到政大去學東南亞語，很用功，受到老師的賞識，現在講越南語都沒問題。」（玉梅：15）

此外，玉梅在訪談中進一步分享自己對於子女傳承母國文化的教養觀念：

「有些媽媽覺得越文沒用，但這樣的觀念是不對的。……她以為孩子在臺灣會中文就好了，錯！你是什麼人就要會什麼語言，因為你有一天會回越南看外婆。如果一句越南文都不會，那要怎麼辦？」（玉梅：19）

家庭內部權力結構對於新住民母親的母國文化認同，以及在家庭中對子女文化傳承及教養的權力有深刻影響，而家庭中的權力結構同時受到家庭社經地位以及新住民母親自身的經濟能力所影響。玉蘭和玉梅自身的經濟能力提升了家庭的社經地位，也讓兩人在家中獲得較平等的對待，家人對於越南文化也更具有認同感。蘭芳和紅英皆從事勞工階級的職業，除了需要投入更多時間工作以維持生計而無法長時間教養子女，也因為無法為家中帶來更好的經濟收益，

其母國文化也在臺灣的家庭權力結構當中被劣化及邊緣化。

綜上所述，在傳統父權社會的家庭當中，女性往往處於權力結構下的弱勢位置。儘管較好的經濟能力能夠為女性提升家庭地位，然而新住民母親面對華人社會傳統婚嫁觀念對於媳婦的隱性壓迫，更讓她們的母國文化在與臺灣人共組的家庭當中不受重視。丈夫跟公婆的規訓壓縮新住民母親在家中傳承母國文化的空間及權力，也讓臺灣社會與族群的主流文化在家庭當中不斷獲得再製。值得關注的是，性別與階級的交織作用對於新住民家庭中的文化再製有深刻影響。訪談結果顯示家庭的社經背景和丈夫與公婆的教養觀念決定了新住民母親在家中的話語權，以及能夠展示與傳承母國文化的空間，最終影響新二代子女的文化認同。

四、教育支持與文化活動參與作為「賦權」的途徑

根據內政部 2016 年所發布《新住民及其子女雙重文化認同及其影響之研究》，指出新住民可透過參與雙重文化活動，認同母國與臺灣本土文化，並將其文化與教育才能轉化為促進臺灣社會包容與多元的力量，增加社會和諧與尊重多元文化之風氣。陳佳莉（2015）的研究也強調移民社群的文化參與，提出應該鼓勵他們參與文化展示、勇於挑戰社會偏見等「賦權」（empower）行動以促進社會平權。因此，透過教育及文化活動參與作為賦權新住民的途徑十分重要。

母親的文化認同及教養觀念對於子女影響深遠，因此提升母親的文化認同及其經濟能力，是增進子女教養及文化認同的關鍵。在訪談過程中，作者發現新住民母親若能積極參與母國的宗教活動或傳統文化慶典，則可強化其文化認同感，提升在夫家的主體性及自信心。此外，新住民家長若能持續透過教育積極學習華語及臺灣文化，除了更有機會增進工作機會並改善家庭社經地位，也對子女的雙重文化認同及未來發展具有正向效益。若能夠善用家庭中的雙語及跨文化優勢教養子女，則更有助於運用教育的力量影響臺灣社會對於新住民多元文化的認知及認同。

然而李淑菁（2022）在其跨文化田野研究中發現，在進行跨文化教育與婦女培力的過程中，應先透過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概念了解讓婦女持續學習的背後因素，才更有機會讓教育目標受眾獲益。該研究指出，除了對於課程內容的需求之外，家庭的經濟因素、女性在家庭中的典型社會角色（如作為母親），皆影響婦女參與培訓活動的意願。因此，在討論如何提升新住民的教育支持與文化活動參與時，應進一步從性別與階級的交織考量新住民群體的異質性，從而思考該如何規劃合適的教育支持機制以達到賦權的目標。

綜上所述，本文建議我國政府與相關社福團體除了持續提供新住民教育及

文化資源，輔導新住民提升語言能力及職業技能以增進改善家庭社經地位的機會之外，亦應在政策制定與方案設計時提升其中的「交織性的敏感度」（李淑菁，2022，頁 105），覺察來自不同社會脈絡、性別與階級的新住民的需求，並思考如何讓他們無後顧之憂（如獲得交通補助與學費減免、規劃合適的托育服務或補助等）的參與培訓課程及母國的文化活動，以促進個人及家庭成員對其母國文化的認同感，強化新住民家庭的文化傳承以及與臺灣社會的共容氛圍。

五、結語

教育部統計 112 學年度各級教育階段的新住民子女人數高達 27.8 萬人，顯示我國近年來新住民家庭的比例越來越高。然而，新住民家庭並非同質，社經地位及新住民母親的經濟能力提升對於新二代的文化認同扮演關鍵作用。以往學界針對新二代的文化與身分認同研究多聚焦「個人」的生命歷程及主體性，卻較少從社會與家庭的「權力結構」對於新二代文化認同影響進行探究。本文創新性將「認同」置放於社會、經濟及文化脈絡當中，並從性別與階級的交織面向，重新審視這些交織向度對於新二代文化認同的建構與影響力。

從社會階級的角度來看，新住民的家庭社經背景對於子女的教養有深刻影響，包含教育資源的投入以及父母或者祖父母對於文化傳承與認同的觀念差異。從性別與家庭權力關係的角度進行分析，母親作為臺灣家庭結構中典型的主要照顧者，對於子女的文化認同與行為參與有直接影響。然而在亞洲父權社會的家庭權力結構當中，母親卻經常處於弱勢地位，進而影響其在家庭中傳承母國文化給子女的教養權。其中，家庭的經濟弱勢更可能會壓抑新住民母國文化易阻礙文化傳承，進而影響子女的文化認同及文化適應能力。

綜上所述，作者呼籲若是能透過具有「交織性的敏感度」的教育支持機制與文化活動參與作為賦權的途徑，鼓勵新住民積極學習華語及臺灣文化，並提升其對母國文化的信心與認同，則有助於改善新住民家庭的社經地位，並有助於善用家庭中雙語和跨文化優勢，建立子女的身分認同與文化自信。長此以往，也能增進我國成為多元文化社會的認知與共容氛圍。本文建議政府與相關社福團體應持續提供語言學習、經濟與教育輔導支援，以促進對新住民的賦權，並強化新住民文化在臺灣社會的多元、平等及共容。

參考文獻

- 內政部（2016）。新住民及其子女雙重文化認同及其影響之研究。臺北：內政部。取自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
- 李淑菁（2022）。那些田野教我的事：跨國、跨文化教育方案的性別反思。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50，75-118。

- 林坤泰（2014）。文化傳遞的家庭權力過程：以越南籍新住民女性家庭教育的經驗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東華大學，花蓮縣。
- 張文馨（2016）。新住民文化展示中的認同與再現——以《艷驚四方——當代臺灣異鄉人創作巡迴展及越南文物》展覽為例。《博物館與文化》，11，83-123。
- 鄭曉雲（1992）。文化認同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陳佳莉（2015）。邊緣與再現：博物館與文化參與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Bourdieu, P., & Passeron, J. C. (1990).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2 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